

■ 学人素描

# 于光远：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开拓者



◎ 邓聿文

在中国的学术界中,于光远是以思想敏锐、学识渊博、勤奋多产而著称的。前不久去世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曾对于光远有过这样的评价:学识渊博,学贯“两科”,即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地融为一体;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开拓了许多新的学科领域,尤其在促进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方面,在自然辩证法哲学学派的创立与发展方面、在反伪科学方面等等,他是勇敢的开拓者和辛勤的耕耘者。可以说,这一评价基本概括了于光远为中国学术、思想以及改革所作的贡献。

## 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于光远原姓郁,1915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和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蹂躏,于光远放弃了成为一个大学物理学家的梦想,参加了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继而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事业中,1937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开始了社会科学研究。如今,作为一位资深学者,于光远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探索半个多世纪了。从早年感应时代的召唤,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除了文革几年下放干校劳动外,他一直活跃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于光远不仅仅是一个勤于思考的学者,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他还是一个长于行动的学者,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于光远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这次著名的会议及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那篇后来被认为是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著名讲话

于光远:以一个经济学家身份出现在中国思想界的大学问家。他学识渊博,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并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

他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他不仅重视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阐明的原理运用于现代经济生活,而且还十分重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改革实践的经济理论发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的手写提纲就一直保存在于光远那儿。从1981年起,他又利用参与讨论中央文件的机会,多次主张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写入中央文件。他的意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于光远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曾较长时间在中宣部工作,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1977年-1982年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所所长。他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去年,又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还担任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名誉会长或顾问。他也是1955年评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学部委员中仅存的四位院士之一,且年龄最轻。

## 兼具深切社会与学术关怀的经济学大家

于光远一生著作等身,代表性著作有:《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一个哲学流派正在中国兴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中国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杂记》、《我的市场经济观》、《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和《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等。当然,作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大学问家,他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的。2005年,在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候选人资料中,推荐人对于光远的评语是:他是一个兼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深切的学术关怀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学术活动中,总是试图寻找二者间的支点,来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广泛的学术兴趣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学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

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早在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就倡导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将这一学科定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有别于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在这一领域,他至今已进行了40余年的研究,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1979年以来,于光远在经济学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在理论经济学方面,他倡议并推动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廓清了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理论认识。同时,他大力提倡并率先进行了一些新学科的研究,比如消费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发展战略学、国土经济学、经济效益学,等等。他不断地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推动了各种经济研究和学术活动组织的建立。于光远还是一位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都有所涉及,并在很多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

比如,关于经济效果,他提出要以个人使用价值(或个人需要的满足)作为社会经济效果的基础,这一观点与当时流行的将政府目标等同于全社会目标的观念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论基础。他正是从这一深层的价值理念上逐步认识到中国改革是必要的。关于所有制形式结构,他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1997年发表的《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中,以条目的形式系统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观点。特别是他一直高度重视唯生产力论问题,很早就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他指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他特别强调,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最高原则,其他任何原则,都不能和这个原则并列。

## 致力于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

于光远不仅重视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阐明的原理运用于现代经济生活,而且十分重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改革实践的经济理论发展。

1983年,在首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提出了要“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在理论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78年访问南斯拉夫以后,他开始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他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应与被看作是继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方面的伟大变革,中国当前所进行的这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跨世纪的任务。

他并强调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关于改革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应当把商品生产问题放在首位。这是因为,发展商品生产在各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阶段中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

他在改革的实践中,不仅注意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注意总结改革的成功经验,而且十分注意改革所遇到的和可能遇到的问题。

关于改革和经营的关系,就是他提出来并反复强调以其引起人们高

度重视的问题之一。他指出,改革应当为经营排除障碍、创造条件,因为经济效益只能通过经营来取得。搞好经营不仅对于巩固改革成果十分重要,而且积极从事经营能使人们有更强的改革要求。他的这一思想,为后来实行承包制改革以完善经营机制的改革措施在理论上作了准备。

他还比较早地研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理论,著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1988)一书。此书被经济学家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1995年,于光远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30年”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可分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是从思想发动经过三次革命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全国解放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我们取得政权后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的30年,在这30年后期,我们觉悟到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了又一新的伟大革命;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第二个30年,在这个30年末,即2008年,中国经济改革可以基本完成,并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本期人物话语



## 目前美国经济避开衰退概率大于50%

格林斯潘(美联储前主席)10月10日在纽约参加一个商业论坛时说,尽管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的经济数据看起来不错,但受房地产市场进一步降温拖累,未来几个月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放慢。目前,美国经济避开衰退的概率大于50%。

## ■ 多声部

### 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成功的经济政策

斯蒂格利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于10月10日在加拉加斯举行的一个题为“新兴市场开发战略”的经济论坛上表示,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中国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其实施了成功的经济政策。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成功是靠低成本劳动力实现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政策鼓励技术发展和建立科技创新体系;中国还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中国将消除贫困等作为重要目标,重视卫生和教育领域的投资,这对于实现社会的稳定很有必要。

### “四位一体”模式:破农村金融难题

林毅夫(北京大学教授)日前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出,选择经营管理良好,有发展前景的龙头企业,推广龙头企业+担保公司+银行+农户的“四位一体”的金融创新方式,有可能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之一。如果由龙头企业成立一家专业的担保公司,来担保和与其关系紧密的农户向信用社或农行的贷款,农行、信用社风险就会大幅下降,贷款意愿大大加强。那么,农户就可以借到钱来发展生产。同样,龙头企业的担保风险也非常小,根据国家的规定,担保公司每一元的资本金可以给高达5至10元的贷款提供担保,这样龙头企业就可以迅速扩大基地规模,做大做强。

### 始终要非常警惕通货膨胀

项怀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日前在参加上海财经大学90周年校庆“部长论坛”时表示,对于目前国内的通货膨胀,已经看到通货膨胀的苗头,国家相关部门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结构性的,另一种认为要考虑治理通货膨胀。但是,今后一段时间,通货膨胀始终要非常警惕,与其局限在结构性、小范围,不如看得严重些。中国既存在需求拉动,又存在成本推动,两个因素都有,要想保持物价不动,不太现实。目前还下不到下结论的时候,今后几个月还需要密切观察。

### 世行提出帮助最贫困国家等六大战略主题

佐利克(世界银行行长)日前在美国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世行的六大战略主题,即帮助最贫困国家,特别是非洲战胜贫困,促进可持续增长;应对刚刚走出冲突的国家面临的特殊挑战;开发一份针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方案”的竞争性菜单,包括量身定制的服务及融资;在跨国问题上围绕区域和全球性“公共物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包括气候变化、艾滋病和疟疾、疟疾以及贸易援助等;支持阿拉伯世界那些推进发展和机遇的国家和地区;在整个世界银行集团培育一个“知识和学习”议程,支持其发挥实用经验的“脑库”作用。

## ■ 来自日内瓦

# 欧美家庭购车首选经济轿车

◎ 徐千惠

今年国庆长假才刚刚过去,很多人乘着假期的空闲时间纷纷采购家庭轿车,国内车市也迎来了十月黄金销售期。今天,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欧美家庭是如何利用车贷方式进行购车的?他们目前首选购买的热门车型又有哪些呢?其实,国外人人都利用车贷方式进行购车的,便捷的车贷让许多高收入的年轻消费群体常常是3年换一辆新车。以奥迪TT为例,这款车车价大约为3.5万欧元左右。以三年期车贷来看,每月车贷还款额度一般不会超过800欧元。以瑞士为例,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工作两三年的话,他的月工资一般有6000欧元。因此,月供车贷的支出并不大。与此相比,中国大学毕业生在工作后要想购车的话可能就没那么轻松了,大多数人还需要父母的帮助才能实现他们的买车梦想。

给人一种运动的感觉。因此,这种车型深受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的特别喜欢。一般情况下,有孩子的欧美家庭至少已有一辆大型轿车,在考虑购置第二辆家庭用车时,他们通常会倾向于买一辆价格相对便宜又停车方便的小型轿车。那么,欧美家庭在买车时会考虑哪些因素?当然,肯定是价格问题。通常,汽车生产厂家会给出一个标准价格为参考价格,但不同轿车销售商的零售价格却会围绕着参考价格上下浮动。例如,一款Chevrolet Cobalt车的标准价格约为1.3万欧元。在美国市场上,Cobalt被称之为最佳的Coupe车。它的性价比被公认为是最好的,标准的空调设备,具有MP3功能的音响设备,马力的148马力及5个速度变档。还有,Hyundai Accent车的标准价格约为1万欧元,车价是惊人的便宜。Hyundai coupe车一般为1.6升、110马力和5个速度变档。在欧美国家,Hyundai车的销售商通常还提供

## ■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

# 唐庆增抱憾半部《中国经济思想史》

◎ 梁捷

阅读近代历史,“茹经老人”唐文治是绕不过去的。他是晚清一代的经学家,又当过农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书。更主要的是,他是中国真正的教育先驱,曾先后创办了两所学校。第一所叫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后来改名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再后来改为上海交通大学。晚年,唐文治又去无锡创办了无锡国学专修馆,收的学生不算多,却先后涌现出王遽常、唐兰、蒋天枢、钱仲联、周振甫和冯其庸等大家。

唐文治的家教也别具一格,后辈都取得不凡成就,尤以两子唐庆诒和唐庆增成就为高。唐庆增虽然受业于经学大师先谦门下,从事训诂之学,但很早就随户部侍郎那桐出使日本,随载振前往英国参加国王加冕典礼,又考察过法、比、美、日等四国国情,回来撰写了《英日日记》12卷。唐文治思想开通,一直鼓励子女向西方求学问。

长子唐庆诒是中国早期赴美留学生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卫挺生等都有交往。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政治学硕士后回国,回到父亲创办的上海交大,任交大外文系主任。唐庆诒在交大教书五十余年,从30年代到80年代,培养出屠岸等翻译名家。

生于1902年的唐庆增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经济思想史家之一。他于1920年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来,又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20年代的哈佛经济学系尚没有熊彼特那时的全面辉煌。但按留学哥伦比亚大学赵迺迺的说法,美国经济学当时有“十大门派”,拥有陶西格、卡弗、波洛克、杨等名家的“哈佛门”还是毫无疑问排在第一。

唐庆增在哈佛学习了当时最新的技术,同时也感染到了“尊重传统,回顾古典”的哈佛学风,这对他以后的治学应该说极有影响。回国以后,唐庆增在上海开始教书生涯,历任吴淞中国公学、上海商科大学、交通大学、国立暨南大学经济学教授,最高职位只是大夏大学的经济系主任。同时,他还加入了马寅初、刘大钧创办的“中国经济学社”,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学界颇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胡适在1920年代末期寓居上海时,经常和一些朋友组织起来讨论中国问题,他们把这个非正式社团称为“平社”。其中包括各方面的学者,既有“新月派”文人,也有罗隆基、潘光旦、丁西林这样的社会科学家,唐庆增亦是其中的活跃分子。胡适认为,唐庆增当时思想上还是反对传统,秉持主流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胡适日记》(1929年6月2日)上记载,“唐庆增先生讲‘从经济上看中国问题’,他把问题看错了,只看‘中国工商业为什么不发达’,故今天的论文殊不佳。他指出中国旧有的经济思想足以阻碍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的发达,颇有点价值。”

唐庆增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首先是制度建设,使得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制度上并驾齐驱。他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之邀,写了《中美外交史》、《国际汇兑》和《国际商业政策》三本小册子,全都收入“万有文库”,倒也畅销一时。

那时,中日矛盾逐渐升级,唐庆增早已有所察觉,从20年代就开始发表反日言论。在1933年出版的《唐庆增抗日救国言论集》里,他分析了中国经济和政治的现状,主张团结起来,积极抵制日货,“我国对外贸易,以国际地位之低落,生产事业之落伍,自有其特殊之情形,不能全以学理绳之。”

此后,唐庆增逐渐转向整理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一方面是他兴趣使然,一方面也有环境的影响。唐庆增的国学功底扎实,西方经济思想的训练也相当出色,这使他做起中国经济思想史来自然就得得心应手。梁启超很早就鼓励这方面的研究,但一直没有合适的人把这门学问做实。虽然已有前人做过一些零散的通史,也有人专门研究过《墨子》、《孟子》等书的经济思想,但都显得粗率,远不能和胡适、冯友兰等人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相比。

唐庆增决心把这门学问做实。他先后在上海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讲一遍改一遍,最终把讲稿改成,1936年以《中国经济思想史》为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介绍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又梳理了儒、道、墨、法、农诸家经济思想的大致脉络,列表成格,便于后人择门径。此书无疑是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巅峰,用哈佛同学赵人侨的话说,唐著以前研究与此相比,不啻“萤火之于日光也”。

可惜,唐著并没有最终完成。出版时注明此书系上册。从结构来看,他梳理完上古的经济思想,下册当研究汉以后历代的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抗战爆发,唐庆增辗转内地,无法续写。1949年后,唐庆增任教于复旦大学,于1972年去世,始终没有完成《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下编。